

竟陵派钟惺
谭元春选集

吴调公 主编
王骥 祝成 选注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选集

吴调公 主 编
王 骧 祝 诚 选注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1 号

竞陵派

吴调公 主编

钟惺谭元春选集

王骥 祝诚 选注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邮编 430022)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

字数:373 千

插页:2

印数:1—1 360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6-00997-5/I·52

定价:7.90 元

为竟陵派一辩

——代前言

吴调公

一 一个命运多舛的流派

中外古今的文艺流派命运各有不同。革命、进步的流派之受到肯定和拥护，反动、落后的流派之受到否定和反对，都是理有必然的。但也还有一些以精华为主而间存糟粕的流派，它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往往因为存在着复杂现象，其结果引起了较多的争论。初唐四杰是这样，江西派是这样，公安派是这样，王渔洋的神韵说也是这样。但它们的遭际却又互为殊异。有的是誉多于毁，有的是毁多于誉，也有的是毁誉参半。当然，毁誉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往往是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流派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而有所变化的。江西派被推崇备至是在南宋和晚清，而在明代前期却受到訾议和摒弃。相反地，王渔洋的神韵说融过去“兴象”、“兴趣”、“韵味”诸说于一炉，风靡一时，但在晚清时代却又转为寥落。

这些都可以说是浮沉迭转的命运。虽说一时冷落，但终未一蹶不振。

然而，却也有一种长期显得命运多蹇的流派，如明代后期的竟陵派，纵使没有被打成反动，但却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或者是

诟病交加的对象，为它主持公论的实在极少。虽说曾经一度盛行并代表竟陵旨趣的评选本《诗归》曾被当时士子“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①，但曾几何时，它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却一直冷落下来了。不仅冷落，而且受到后代某些不同流派、观点的作家所一致讥评、攻讦。直到当前，竟陵派的作品和理论基本是被否定的，仍然是被判定糟粕为主，而它的某些精华，也被说成“糟粕”。

怀着最大的偏见，首先把竟陵派攻击得体无完肤的是明清之际的钱谦益了。天下事有极妙者，竟陵和公安在反对七子摹古派而力倡发抒性灵的一而，精神原本是共同的，然而这位虞山一老，虽对公安致以好评，而对竟陵却大肆谩骂。他把竟陵的首领钟惺和谭元春的诗文比成“诗妖”，说成“鬼趣”。说什么读了他们的诗文，就“如幻而之鬼国，如梦而之鼠穴”^②。这显然是一派恶毒攻讦之词。

略后于钱谦益而对竟陵派深恶的是顾炎武。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学术家，他是无愧的。他极力主张“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③。以实践家的精神反对门户标榜和徒托空言，这当然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但他对明代的公安、竟陵中人，并没有进行具体分析，把他们一律看成为标榜门户、立异为高、欲以文名的人物。他没有知道钟惺听了人家给他加上“竟陵一脉”的话曾经感到十分不安，竭力要人家为他“削此竟陵之名与迹”^④的事。他也没有把钟、谭的耿介作风和某些不学无术的浮滥文人以竟陵相标榜，作为敲门的手段这二者区分开来。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他做出了晚明文人的“空言”为“亡国之征”的判决，认为明代的“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是晚明文人“空言”的结果，从而给予钟惺以“小人而无忌憚者”这样一个恶谥。

与钱、顾的强烈谴责鼎足而三的是清代的著名浙派词人朱彝尊。出于他强调填词要“归于醇雅”（汪森：《词综序》）和“歌

咏太平”（朱彝尊：《紫云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的文学观点，出于对词律的严格要求，他对竟陵所强调的、代表当时不得意知识分子的苦思冥索的构思主张和一反墨守常规的作品，自然是没有好感的。在他编选的一部极其庞大而又肆意低诋的《明诗综》中，入主出奴地攻击了许多作家。对竟陵的不适当的否定就不用说了。在该书所转引的《静志居诗话》的一段评语中，他也唱起了前人所诅咒的竟陵为明代亡国之征的老调：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曰日蚀、星变、龙荒祸福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遗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著一字之幽务求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而一时纸贵。吴人张泽、华淑等闻声而遥应，无不举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

这种论调比起钱谦益、顾炎武来，就更饱含着“天人感应”的色彩了。

除此以外，对竟陵派运用挑剔方式，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以为否定根据的，也不算少。

最早是顾炎武对《诗归》提出所谓窜改之风的指摘。如：

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

且不说“考”、“老”本可相通，即使钟惺在此处改动得不对，但评论一部意在赏析的书，就凭文中的一点两点讹误而抹煞全书，弃全书的根本旨趣于不顾，这是不能使人心服的。同时他的所谓

“武帝”之说的考订，虽说表现了他的治学谨严态度和博习精神，然而有时确不免忽视了文学的想象、虚构特色，把文学与历史等同，这就难怪他用考证昭君出塞路线的方式去指摘李白了。

后于顾炎武的所谓“改字”说，前后相继地出现了毛先舒和宋荦二人的指摘。他们抓住了钟惺和谭元春倾心于境界幽深，而相对地忽略其侧重意境悠远的特点，并加以拔高，提出了极不公平的评价。毛先舒总算是首先虚虚地说明了前后七子的乖误确应纠正，但笔锋一转，却又过分强调钟、谭的纠正前人不得其法。说他们“所见如窻中窥日”，是“驰骋小慧，河伯自欣”^⑤；至于宋荦，则大谈“诗道”之应该“广大”，应该“灵通变化”，而钟、谭则偏偏把“诗道”搞得“狭小”，搞得“拘泥穿凿”，终于他给钟、谭的评语是：“似鬼窟中作活”云云。为了形容钟、谭诗境“狭小”，他用了杜甫的“海涵地负”和韩愈的“鳌掷鲸呿”^⑥与之相比。其实他完全忘记了刘勰早已说过的“才性异区，文辞繁诡”（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的话，忘记了严羽所说的李、杜各有所长，不可能互相代替的道理^⑦。钟、谭本以幽逸奇诡见长，这就好象奇岩幽洞本以壑渺深邃取胜，要说用长江大河的洪波万顷要求它，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符合古代文论中历来论述的“体性”各有长短的道理的。

除了从境界上做文章以外，也还有一种着眼竟陵的小疵而不概其余的一类指摘，这就是把钟、谭不符合正统的东西加以歪曲，或者将某些一偏之见扩大化，从而加以全面否定。这在清代，与朱彝尊基本同时的纪昀可为代表，在近代则有林纾。明明竟陵派在语言上是有创造性的，可是在纪昀眼中却认为是“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⑧。“新隽字句”有什么不好呢？钟、谭的诗文由于受了晚明解放思潮的激荡，短句多，迭句、迭字多，助词、介词多，有时可能形成不适当的散文化，但却也有助于文笔的条畅。往往愈是条畅之处，也就愈是钟惺所说的“性情之言”^⑨。可

是林纾却说什么他的文章：“时病流走，过目即逝，不复耐人寻绎，谓之轻可也。”这就完全无视于竟陵派重“厚”的主张了。至于他评论谭元春则更不符合事实。他说谭“极力摹古，追逐不至，乃时露丑态，则果轻而儻矣。”^⑧其实谭元春的学习古人，是极其重视得古人真髓的。比如他说过这样几句精辟的话：“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⑨请问这样的体会该多么深刻，难道还能说他是“追逐不至”吗？至于谭的创作，朱之臣赞扬其“清微静笃”，能“传古人之深意”（朱之臣：《寒河诗序》），“轻而儻”是与他绝对无缘的。

综观上述，这些攻击、排诋、歪曲、挑剔，虽说内容和方式各有不同，但归根到底，一概表现了清初以来各种正统文艺观对一个作为“异端”的文学流派的攻讦。只要我们检查一下这些挞伐者的文艺思想本质，就可以发现他们不是和明代复古派有过渊源，就是以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的捍卫者自居，不是极力提倡“温柔敦厚”的风格以歌颂升平，就是神往于攘斥异端的桐城派文人。

为了辨明论争的真相，为了实事求是地辨明竟陵派的精糟，我们要力辟一些于理无据的对竟陵的责难。

二 驳所谓竟陵派的“孤芳自赏”说

责难竟陵派的人首先往往都是抓住了钟惺的所谓“幽情单绪”作为这一流派排斥现实性和社会作用的“罪状”。显然，既名曰“幽”，这就好象是置国家兴亡和人民疾苦于不闻不问了，就是抓住头发要离开地球了。既名曰“单”，就是独来独往，不与世人为伍了。这样一来，竟陵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首先在思想内容上就站不住脚，那么对它的否定和抨击，自然也就是理有固然了。

这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幽情单绪”的实质。

“幽情单绪”标志着竟陵派文人的时代苦闷是毫无疑问的。由于襟怀郁勃，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孤怀独往、兀傲颓唐的文风，确有其回避现实的一面，较之杜甫休目于“乾坤含疮痍”（《北征》）的高度现实主义精神，诚然是有逊色之处。但他们能出于愤世嫉俗之心，制造出幻想的幽玄境界，作为众醉独醒的精神寄托，毕竟不失其为耿介高洁。说钟惺等人孤芳自赏未尝不可，但与此同时，也应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因此，我认为“幽情单绪”恰是明代后期代表小地主阶层对当时朝政和社会风气极端腐败，发为憎恨绝望而又不肯公然抗争的思想特点。

从“幽情单绪”中，人们可以看出竟陵派之所以发源于湖北竟陵的时代折光，决非偶然。就在钟惺二十六岁、谭元春十四岁那年，武昌闹过一次民变。起因是，明神宗为了大事搜刮，曾经派出太监陈奉往湖广一带横征暴敛。“恣行威虐，惨毒备至”。甚至“白昼恣奸于寺，反接倒悬，而攫人之金，金不可得，则拶妇之乳，断童稚手腕”（《明通鉴》卷七十二）。在这样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地方上的许多秀才聚集起来，“哗于兴都，震惊陵寝……逮系诏狱，累及道、府、县。”（《钟祥县志》卷二十）一直闹到二十九年四月，明代中央这才有所戒惧，把陈奉撤回。就此一端，湖北以至整个明朝统治下的夜气如磐，可想而知。难怪钟惺读了当时邸报发出这样的喟叹：“冰山往崔嵬，谁肯施螳臂？”（《邸报》，《隐秀轩诗》地集）他把当时的政权统治比成冰山，山虽高却易于消溶。其诅咒之情，值得深深玩味。然而即使如此，他从来不敢象他家乡的秀才出来闹事，而只能发出国事无人收拾的慨叹。他不是完全没有看出“乾坤”的“疮痍”，他也说过自“居乱世之末流”（《与熊极峰》，《隐秀轩文》往集）这一类话。当他初任官时，也未曾不“有意于用世，讲求当时利弊，孜孜兀兀，至厌落文章，为经生业不逮”；可是因为后来遭受打击，在仕路坎坷中，认识到世事险恶，结果只有“变计易虑”，“以著述自娱”¹²

了。但即使如此，他对人民苦难的关心并未消减。在《柴谷》一诗中他曾经表示过这种出自内心沉痛的同情：“吾宁舍口腹，黽勉充尔需。”虽说这类诗文为数不多，但却说明他的“幽”、“单”决不是真正失却人间烟火气。

也许有的同志要对此进行质问。钟惺不是恰恰就夸耀过“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⑬之妙吗？是的。但必须明了这种所谓“无烟火”实指避俗而言。钟惺为人“性如冰霜，不喜交接世俗”，而“待士”却很“诚厚”^⑭。他之所以耽喜“幽情”只是一反颓风。虽说他不可能用积极态度对世事大力抨击，但他却极力要求文人沉吟于一种“简远”的心境，从而使胸怀淡泊，寄情高旷。他的“幽”、“单”在艺术构思上主要是托意深悠，饶有余味，即《唐诗归》中对张祜《杪秋登江楼》一诗评语中所谓：“幽情高兴，言外可想”。在思想内容上则恰是：“性情渊夷，神明恬寂”。但归根到底，仍然是通过绝俗，以回避一切“不欲闻之语，不欲见之事，不欲与之人”^⑮，得以自葆高洁，出污泥而不染。尽管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事，也是一种回避现实的行动，然而对生活在那一个特定时代的古代文人说来，这种寓有一定反抗因素的消极思想是有其进步性的。

对于“幽单”之流为怪僻和独往独来，恐怕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沽名钓誉的“幽单”，不近人情甚或背离人情的“幽单”，自然不好。然而如果把这种怪僻和独往独来，放在明朝中后期那一个具体时代进行考察，对其具体内涵当可涣然冰释。由于当时市民思想的兴起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潮的蓬勃，竟陵派被封建传统势力目之为异端，甚至看成狂人，是决不可免的。然而由于这种进步势力渊源有自，它并不孤单。历经明代中后期以至清初，反对虚伪、矫枉和提倡独抒性灵的新文艺思潮，几乎象滚滚怒涛，以不同作家的不同主张撼动了封建的传统文坛。李贽以其“童心”说进绝个性的枷锁，汤显祖以其“一生爱好是天然”的主张反对

摹古，公安派以其“性灵”说排抵陈陈相因，这都是旗帜鲜明的。至于竟陵派的主张“幽情单绪”，则比较容易引起误解，也许被认为只是提倡骚人墨客的孤怀。其实他们的“幽情单绪”也还是个性自由解放思潮的一脉相承。他们代表了小地主阶层和不得意的中下层官吏，以比较纾邈的方式，表达其不满现实的市民意识形态。他们没有徐渭和汤显祖那样强烈的批判精神，也不像公安派的比较赤裸裸的嘻笑怒骂的形式。他们只是在沉潜于适合自己性灵的古人艺术境界中寻找慰安，怅望千秋，在既强调“学古”，而却又限于要学“古人真诗”的条件下提倡独创性，以期通过兀然自立，获得个性的自由、解放。

事实很清楚，竟陵派中人几乎极大多数都是不谐于浊世，表现其傲兀之气并提倡孤峭文风的。此外，也还有一些竟陵派后期人物，以明代遗民身分，而表现其封建士人的耿耿孤忠以及与之相应的文风中的“幽单”情绪。竟陵派中官居高位兼该流派主要的热心支持者，钟、谭的挚友蔡复一，就是被称为“耿介具大节”的人。“既歿，囊无馀资”。（《明史》卷二四九）另一位曹学佺，是一个高官，与钟、谭颇相通好。他的诗恰如其人，被称为“幽襟素韵，不暇雕饰”（朱隗：《明诗平论》卷一）。他是魏忠贤的反对派，后来在南明时期又曾随唐王殉国。他如钟、谭的好友徐波，明亡后“居落木庵，断炊绝粒”（卓尔堪：《明宋四百家遗民诗》卷三），除了仅仅接受一个好友的周济外，其他人馈赠一概拒绝。还有，情况很有点像宋代荃萃文人于一家家长苏洵的福建人林章，曾因关心民生疾苦，条陈停止矿税的主张，“大拂柄国者意，密揭下诏狱”（张昞等：乾隆十二年刻《福清县志》卷十四）。他的儿子林古度则是一位享寿极高、晚年长期过着艰苦生活而始终不废其节操和吟咏的诗人。为竟陵派诗文大力鼓吹的张溥，系复社领袖之一。“喜臧别可否”而毫不容情。“人有过，尝面叱之”（《明史》卷二八八）。如此等等，都说明竟陵派由兀傲、狂狷而

导致的“幽”、“单”之风。

总之，说竟陵派严重脱离现实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所谓“幽情单绪”确实是反映了古代文人中常见的寄心杳冥作为抗愤浊世的精神寄托。

三 驳所谓竟陵派主“信笔扫抹”说

如果说非难“幽情单绪”，是从思想内容上反对那种争取个性解放而不免近于狂狷的文学思潮，那么，硬要把那种率性而行、信口而出、不落格套的极其宝贵的文学作品说成是信手涂抹，那就可以说是从构思和技巧上妄加攻讦了。尽管二者着眼点不同，而其用正统观点来攻击“异端”，排斥代表市民意识的新思潮，却是如出一辙的。在思想上遏抑性灵，就必然要反对公安所主张的“若哭若骂”（袁宏道：《叙小修诗》，《袁中郎全集》卷一）之文，和竟陵所主张的“性情之言”（鍾惺：《陪郎草序》，《隐秀轩文》彙集）也必然要在文章风格上反对竟陵的天真之趣，把“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谭元春：《汪子戊己诗序》，《鹄湾文草》）的主张贬为信笔涂抹。

最早用“信笔扫抹”的贬词来非难竟陵派的是清初王夫之。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艺思想上，王是有贡献的，对于明代文坛的党同伐异、高自位置、互相攻讦那些不良风气进行抨击，也是中肯的，但由于王夫之所受的封建正统观点影响较深，因而对于以李贽为渊源的公安、竟陵所强调的抒发性灵，从来没有好感。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薑呷醋”。故万历壬辰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如必不经思维者而后为自

然之文，则夫子所云草创、讨论、修饰、润色，费尔许斟酌，亦“咬菰呷醋”耶？（王夫之：《薈斋诗话》卷二）

虽说这里被点名的只是李贽和公安派，但显然也包括竟陵派在内。这正因为，王夫之对谭元春有过呵斥，而况他说万历以后文风衰敝，语气也显然越出了公安。再说王指责的所谓“信手扫抹”实即指竟陵崇尚的“性灵”的自然抒发，而“抒性灵”旗帜，又恰恰是公安、竟陵两派所共举的。

究竟竟陵派是否是主张“信手扫抹”呢？事实决非如此。

诚然，竟陵派领袖钟惺一贯提倡抒发性灵，但他对创作的惨淡经营也同样十分重视，特别是在学古上强调要首先领会古人的真精神。他固然提倡能“言其所欲言”（钟惺：《板言小引》、《隐秀轩文》晨集），但却又反对泛泛而谈、千篇一律，所以他在与友人书中谈到创作甘苦时，深以“似觉渐离粗浅一道”（钟惺：《与蔡敬夫》，《隐秀轩文》暮集）为乐。难怪徐波说他的诗文：“斧凿久而渐近自然，波澜阔而乍归平易”^⑭。朱隗评他的山水诗“又刻划，又浑成”（朱隗：《明诗评论》卷二）。这两家的评论是相当全面的，并非阿其所好。较之只看到锤炼的一面，或只看到平易的一面大不相同了。王夫之是只看到他的平易一面而误会为“信手扫抹”的。与其相反，陆云龙则又仅仅看到他“千锤百炼，剔肾剥心，句推字敲”^⑮的一面。

钟惺的影响是巨大的。竟陵派中人虽说谈不上都有他那样的艺术成就，但他们一般却都能受到竟陵流风的熏陶，注意性灵而兼深厚，亦即思想内容深刻和艺术的真诚相结合。尽管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要求，很难达到，但他们当中某些人或某些作品，大体还是能得其具体而微的。如竟陵派的热心鼓吹者吴江张采，被张溥被誉为“苍远深厚，灵朴幽越”^⑯。这八个字可以说是竟陵派根本理论的概括，也是竟陵派优秀作品的共同特征。难怪同竟陵有

深切关系的这位复社领袖，不但指出竟陵之于张采蔚为其根源，而且把张采的成功归结为“竟陵之功，要不可诬”了。他如又一竟陵派健将、诗人兼画家商梅（孟和）的吴中诗作，曾被评为“浅而无痕，深而有力”^{①9}。无锡华淑的诗作被评为既能“偶然拈出”而又能运斤意象，得“立意立局之高”^{②0}。这些事例，都说明竟陵派决非“信手扫抹”。他们之所以力图刻划深远的意境，实质上是由于对竟陵派极意主张的“幽情单绪”的服膺，也是由于力图补救公安派在抒发性灵中偶或流为浅率、浮滑的偏向。

四 驳所谓竟陵派的“但趣新隽，不原风格”说

毛先舒对钟、谭的责难，有所谓“但趣新隽，不原风格”之说，这在前文已经谈过了。这句话前后两句，意义原本相通。“但趣新隽”是指猎奇炫异，卖弄小慧；“不原风格”是指无视传统，学问无根。其实这都是不切合事实的。

先说竟陵派的“新隽”问题。竟陵派的确是主张要在诗文上别寻新路的。尽管他们的新路不是没有可以疵议之处，但他们的反对七子和在反对七子上修正公安派的主张，愿望是良好的，创作和赏析作品，也颇有新见，绝不容一概抹煞。就以钟惺而论，他的所谓“新隽”实际是有一定条件的。他并不一概反对学古，而只是反对七子中某些生搬硬套，抛弃古人精神，追求古人的框框套套，或者空洞无物而表面似乎大声铿锵的作品。他并不反对崇尚性情，而只是反对公安派文人某些流为浮滑庸俗的作品。从力图纠正前人之失来说，这证明具有更新的精神。因此他敢于把公安派的“循其所必变”^{②1}的抨击七子复古派诗论的精神，和诗人必须抒发个性这两者扣合起来。认为学古并不是泯灭自我，相反地是要“内自信于心，而上求信于古人在我而已”^{②2}。“古人在我”！这是何等石破天惊！这种“新”又岂是隽趣之“新”所能包括！

当然，竟陵派也不是不讲究“雋”。按照“雋”字内涵，一般多指“雋永”而言，亦即表示味甘美而意义深长。在这一点上，竟陵派的反对浅薄而力求深辟，恰恰可以说和这一种风格吻合。陆元龙评钟惺有云：

作者（指钟惺——调注）所为，千锤百炼，剔骨剜心，句推字敲，求解人于当时而不得者，皆有以学其苦。……故其苦于锻局，若九嶷、三湘之濛回曲折，妙有天造地设之奇；苦于运笔，若湘水、巫云之飘忽飞流，极有轻扬灵活之致；苦于修词，若鸟林、梦泽之烟紫风织，曲具菁葱纹黻之观。宁简无繁，宁新无袭，宁厚无佻，宁灵无痴。工苦之后，还于自然。^②

这一段从艺术风格下手，发为娓娓动人的形象描绘的精辟论析，虽然决不仅限于“新雋”一端的说明，但却使人们看了这段文字后得到一个印象：钟惺的“新雋”决不是故为卖弄小慧，故为轻佻，或者变相抄袭古人的语言。他分明是说要“宁厚无佻”的。这种“新雋”是他评孟浩然诗时所谓“静远”^③，是他评释灵彻《华顶》时所谓“极深，极广”^④，也是他评刘禹锡诗时所谓“胸中笔下，别有所领”^⑤。

也许毛先舒还可以提出质问：即使竟陵的“新雋”并非轻佻，但他们这一派毕竟是“不原风格”的。但事实也并非如此。

先说“风格”之“原”。渊源前人的“会通”、“适变”^⑥本来是不可少的。平地楼台并不等于创新。然而竟陵派决非如此。学古是竟陵派的一贯主张，大家都已经熟知了。但必须进一步说明的是，竟陵的学古既不同于江西派的脱胎换骨，也不同于七子复古派的硬是要把古人的心灵填充到自己心上，从而夸夸其谈地说什么必“取材于经史而镕意于心神”^⑦。钟惺反对着眼于古人的肤浅之处，一再强调要汲取古人的“真精神”、真风格。认为善于学

习古人的真谛，才算是正确领会古人的精神。而“真诗所在”就是精神所为。甚至扩而大之，要人们在鉴赏古人描山范水的诗文时，要悉心体验古人襟怀神韵而与古人共鸣，即“以吾与古人之精神，俱化为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字，不作两事，好之者不作两人。”^{②8}由此可见，钟惺的学古决不仅仅限于“取材”和用事，而能深入于古人的审美经验、审美情趣和构思技巧之中。这主张决不仅仅限于钟惺，竟陵派中人对此寄予重视者大有人在。他们都重视创作与鉴赏的息息相关，力主作者神思应与古人相通，从而领会其精神、风貌，以资借镜。如谭友夏被评为“不为古人役而使古人若为受役”^{②9}。说明他决非不屑古人，他要求的是以“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③0}朱隳就更把古人对今人的启发，提炼为这样极其醒豁的法则：“古人之幽感于今，今人之兴起于古”^{③1}。总的说来，竟陵派从来没有主张诗文之作可以废学，十分强调要力探古人之幽，得古人之真，而且要汲取古人之真精神化为己用，从而使自己诗文富于不可有二之特色。不可有二是“奇”，广泛汲取古人是“博”。因此钟惺评论谭友夏文饶“奇俊辨博”之观，固然道出谭文的特色，也未尝不表明竟陵派主张在渊源前人风格上达到“新隽”境界的远大旨趣。

当然，毛先舒所指的“风格”主要固然意味着文学渊源，但也多少涉及到对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的主张问题。关于这一点，竟陵派领袖发表的文论见解的深辟，那就更多了。怎么能说他们“不原风格”呢？

就风格的多样与多样风格的相辅相成而言，竟陵派是密切注意的。单用“新隽”来概括竟陵风格主张，自然是不确切的。钟惺不是曾享谆告诫过他弟弟钟惺“慧处勿纤，幻处勿离，清处勿薄”^{③2}么？而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作为竟陵主要旨趣之一，是极力主张“灵”与“厚”相结合。片面讲究性情的随意而发，其结果就难免流于浅率，这正是公安的流弊。为了对它有所纠正，钟、

谭特别强调性灵与浑厚二者必须兼谙。钟惺说：“厚出于灵”^{③4}。谭元春也有过类似的话。他说袁宏道“有卓大坚实之文，出自痛快俊颖之手。”^{③5}

就艺术风格在特定作家身上的具体表现而言，竟陵派对此也早有探索。他们不像过去钟嵘《诗品》对风格的研究，大抵侧重于文学史派流中的渊源影响，也不同于钟嵘仅仅着重作家风格特色的概括，而能指出各家风格之所以形成的底蕴，深入到他们的文学素养、构思、特色等对风格所起的作用。甚至联系到他们的艺术气质和处于沉吟视听中的“神思”特色。如谭元春之评陆机：“二陆才名，千古一词；然手重不能运，语滞不能清，腹之所有不能再挥，韵之所遇，不能稍变。”^{③6}具见其悉心体验古人素养，深知古人创作甘苦。由于能详备地辨识作家构思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所以能把古人长短两方面综合起来，通过构思的复杂性以阐发风格中的多种因素。首先有“才性异区”，然后有“文辞繁诡”^{③7}。评论风格而如此追溯才性，难道还能责备他“不原风格”么？

就风格变化言，竟陵派对这方面的评论也决不失之粘滞。由于竟陵派一向注意汲取古代优秀诗文的真精神，而与其冥合，以自出性情，所以必然反对袭古人皮毛，而与公安的“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③8}的精神相沟通。竟陵派的“原风格”不是泛泛而谈的。他们要“原”的是古人风格的真髓。因此，他们的“原”，虽说有时不免失之偏颇、纤细，但大体却能从大处着眼，注意到文艺思潮的更迭、流派风格的变迁和历史文坛对前人因革的长短。例如，钟惺说过这样一段极其警辟的话：

大凡诗文，因袭有因袭之流弊，矫枉有矫枉之流弊。前之共趋，即今之偏废；今之独响，即后之同声。此中机挟，密移暗度，贤者不免，明者不知。^{③9}